

引用格式: 马小琦, 赵娜. 与儿童谈生论死——部分中国父母“死亡话语素养”现状调查 [J]. 华人生死学, 2024, (2): 36-47.

华人生死学 >>>>>>>

CHINESE LIFE AND DEATH STUDIES

死亡话语



与儿童谈生论死

——部分中国父母“死亡话语素养”现状调查

马小琦, 赵娜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中国父母在开展儿童死亡教育过程中所展现的“死亡话语素养”, 即认知层面, 父母是否具备关于儿童死亡教育和跟孩子谈论死亡的客观知识; 态度层面, 父母是否有公开、正式和孩子谈论死亡的情感 and 行为倾向; 话语实践层面, 父母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开展儿童死亡教育, 以及他们采用的言语行为方式。研究采用“儿童死亡教育调查问卷”

责任编辑: 邹明明

收稿日期: 2024-06-08

接受日期: 2024-11-30

发表日期: 2024-12-31

作为主要工具, 并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 收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289位中国父母的问卷数据。此外, 基于自愿原则, 对12位参与者进行了深入访谈, 并对访谈录音进行了主题分析。研究发现, 在态度层面, 参与调查的父母普遍展现出积极和开放的态度, 对儿童死亡教育的重要性有着较高的认可。在认知层面, 虽然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的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但仍存在提升空间。在话语实践层面, 父母倾向于利用死亡相关绘本和电影作为教育工具, 但在具体的死亡主题活动, 如临终告别、葬礼、扫墓等方面, 参与度尚显不足。访谈材料与问卷调查基本一致, 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中国父母“死亡话语素养”现状的多种因素。本研究不仅揭示了中国父母在与孩子谈生论死时的“死亡话语素养”现状, 而且对儿童死亡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以促进中国父母“死亡话语素养”的养成和提升。

关键词: 儿童死亡教育; 死亡话语素养; 认知; 态度; 话语实践

中图分类号: R-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957-370X (2024) 02-0036-12

一、研究背景

“死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一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死亡教育的发展可以追溯至1903年, 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首先提出了“死亡学”的概念。1912年, 美国医师罗斯韦尔·帕克将死亡学引进美国。在我国, 1988年, 《医学与哲学》杂志第一次刊登阿尔万斯·达凯恩的《死亡教育》译文, 这可以视为我国关注死亡教育的发端^[1]。

死亡教育广义是指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所进行的旨在指导人们如何正确认识、应付和面对死亡现象以及与死亡相关问题的教育^[2]。具体来说, 死亡教育就是将有关死亡与濒临死亡(dying)及其生



活相关的知识传递给人与社会的一个教学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从医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不同方面帮助人们深入思考死亡的价值、意义,增进人们对死亡及濒死的认识和理解,提高人们的生命生活质量^[3]。对于儿童而言,死亡教育是帮助他们正确面对自我之死、亲人之死、他人之死和其他生物之死,理解生与死是自然生命历程的必然组成部分,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死亡观,消除对死亡的恐惧、焦虑。当儿童真正意识到人生是有期限的时候,才能更懂得珍惜和欣赏生命^[4]。

索甲仁波切^[5]讲道:“我们不应该保护孩子们不去接触死亡,反而要趁他们年轻时,让他们认识死亡的真性质,从死亡中学习。为什么不以最简单的形式,把这种见解介绍给所有年龄层呢?我们必须让社会所有阶层都认识死亡,知道如何帮助临终者,以及了解死亡和临终的精神性质。”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首先在医学界引入死亡教育,许多医学杂志,如《医学与哲学》《中国医学伦理学》《中国护理杂志》《临终关怀杂志》等都刊登了有关死亡教育的文章。但是,涉及在儿童中开展死亡教育问题的内容却很少^[2]。自2004年开始,辽宁(2004年)、上海(2004年)、云南(2008年)等地相继出台了有关中小学实施生命观教育的条例^[6]。

进入21世纪,死亡教育已经越来越受到我国教育界的重视,涌现出一批儿童死亡教育的相关研究:一些研究者关注绘本相关的儿童死亡教育研究^[7-9],通过对儿童教育语篇的多模态分析,叙事分析等多种角度探究死亡意义在绘本中的建构;一些学者则关注医疗相关领域的儿童死亡教育研究^[10-11]分别对癌症儿童及艾滋病致孤儿童的死亡教育策略进行了探讨。徐艺玮^[12],康滨^[13]分别以深圳市D社区和甘肃省Y镇为例,从小组社会工作介入的角度分析了儿童死亡教育的相关问题。以上的儿童死亡教育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对家庭教育或者家长的角色有过多的关注。Everett^[14],Cruse & Cruse^[15]对于如何帮助家长和孩子谈论死亡以及家长对于死亡教育的态度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在国内,赵立奇^[16]以震后北川地区为例对家庭生命教育的现状进行了研究;祁静、曹能秀^[17]通过对昆明市Q幼儿园幼儿父母对死亡的认识、对死亡的态度、对死亡教育的理解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究了幼儿父母的死亡教育观。

综上所述,对于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的研究多侧重学校、社区等层面,父母个体对儿童死亡教育的认知和态度等研究尚且不足。父母作为儿童死亡教育的实施主体,他们自身对死亡的认知和态度与开展死亡教育的认知、态度等方面密切相关,因此,父母本人的“死亡话语素养”^[18]将在儿童死亡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将以“死亡话语素养”为理论框架和基础,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中国父母在开展儿童死亡教育时展现出的死亡话语素养。

二、理论框架及研究问题

基于医疗领域“死亡素养”和社会语言学“新素养”理论,罗正鹏,高一虹^[18]提出了“死亡话语素养”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人们使用各种话语形式谈论死亡(和濒死)相关议题,参与社会实践,探索和积极建构生命意义的能力和过程”。就具体内容而言,死亡话语素养包括三个层面:认知



层面是指具备关于死亡和谈论死亡的客观知识;态度层面是指养成公开、正式谈论死亡的情感 and 行为倾向;话语实践层面是指对死亡相关口头、书面、多模态话语形式的消费和生产。具体包括对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死亡相关语类,以及死亡相关词汇及言语行为的使用。需要指出的是,死亡话语素养不仅强调人们在认知层面对死亡相关语类的熟悉,更关注人们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对这些语类的使用,以及所建构和传达的生死观念。

本研究将“死亡话语素养”这一理论概念应用于儿童死亡教育的场域中,通过问卷及访谈的方式对中国父母开展儿童死亡教育时的死亡话语素养现状进行考察,旨在回答三个研究问题:

- (1) 认知层面,父母是否具备关于儿童死亡教育和跟孩子谈论死亡的客观知识?
- (2) 态度层面,父母是否有公开、正式和孩子谈论死亡的情感 and 行为倾向?
- (3) 话语实践层面,父母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开展儿童死亡教育,采用了怎样的言语行为?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中国父母在开展儿童死亡教育时展现出的死亡话语素养,研究主体包括问卷调查和访谈两部分。

(一) 参与者

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及邮件等方式发放问卷,问卷调查对象为儿童的父亲或母亲,研究者在收集问卷后会通过孩子年龄这一人口学选项剔除掉无效问卷,共收集到有效问卷289份(表1)。

表1 问卷参与者人口学变量分布:性别、学历、年龄、丧亲经历($n=289$)

	性别		学历			年龄				丧亲经历	
	男	女	大专及以下	大学本科	研究生	20-29	30-39	40-49	50-59	是	否
n	54	235	37	100	152	3	101	170	15	134	155
%	18.69	81.31	12.8	34.6	52.6	1.04	34.95	58.82	5.19	46.37	53.63

研究的访谈对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自愿接受后续访谈、留下联系方式的问卷填写者中抽取,并遵循“信息饱和度原则”共访谈了12位父母(表2)。

(二) 测量工具

该研究主要测量工具为自制“儿童死亡教育调查问卷”,题项参照国内外死亡态度量表并结合文献^[19]编制。Corr, Nabe & Corr^[19]提出关于死亡、临终和丧亲的教育有认知、情绪、行为和价值四个维度:认知维度是指提供与死亡相关的经验和事实信息;情绪维度是指与死亡相关的感受、情绪和态度;行为维度是指人们在与死亡有关的情况下会怎样做,他们的行为对死亡教育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以及他们可以或应该如何采取行动;价值维度是指死亡教育可以帮助人们识别、表达和肯定人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一维度划分中认知维度着重指知识和经验认知,价值维度更侧重态度,因此,本研究通过认知维度考察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的认知(如量表中题30:我知道该怎么跟孩子开启死亡话



表2 访谈参与者人口学特征

编号	年龄	居住地	职业	学历	是否有丧亲经历
F1	30-39	长沙	教师	研究生	是
F2	40-49	新乡	教师	研究生	是
F3	40-49	北京	编辑	研究生	是
F4	50-59	北京	媒体	研究生	是
M1	30-39	秦皇岛	教师	研究生	否
M2	30-39	太原	金融	研究生	否
M3	40-49	昆明	教师	研究生	是
M4	40-49	北京	教师	研究生	是
M5	40-49	北京	公益	研究生	是
M6	30-39	北京	社工	本科	是
M7	30-39	南通	护士	本科	否
M8	30-39	北京	影视	本科	否

题),进而反映父母认知层面的死亡话语素养;通过情绪和价值维度考察其态度(题22:我觉得有必要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反映父母态度层面的死亡话语素养;通过行为维度考察父母开展死亡教育的活动(题35:我带孩子参加过葬礼、追悼会等纪念死者的仪式),反映父母话语实践层面的死亡话语素养。

基于以上理论,问卷主体最终调整确定为以下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家长本人对死亡的态度,包括6个题项,通过正反向题目考察父母本人对死亡是否恐惧,焦虑,避讳;第二部分则以家长对儿童死亡教育的认知、家长进行死亡教育时的情绪、家长进行死亡教育时所采取的行为以及家长对死亡教育的价值认识四个维度设置题项,变量名称简化为认知(6个题项)、情绪(6个题项)、行为(10个题项)、价值(7个题项)。实际测量时,题项以语义正反向混合的方式编排,形式为李克特五级量表。

(三) 实施过程

该研究于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之间实施,参与者在电子版问卷首页勾选了知情同意书。研究者本人具有高校英语教师,社会语言学在读博士,死亡教育相关活动实践者以及两个孩子的母亲这样一些多重身份,因此,问卷发放的微信群主要为高校教师群体、死亡话语与教育相关活动群以及妈妈群,问卷群发后有部分群友转发。研究通过以上方便抽样的原则共回收问卷338份,剔除漏填无效问卷后,又依据孩子的年龄对数据进行手工剔除,删除了独生子女孩子年龄大于等于18岁的样本,同时保留了第一个孩子大于等于18岁但第二个孩子属于未成年的父母样本数据。最终该研究有效样本数量为289份,问卷整体信度值Cronbach's α 达到0.897。问卷变量具体信息如下(表3):

在回收问卷后,研究者于2023年2月对部分问卷参与者进行了视频或语音形式的半结构化一对一访谈。访谈平均时长为30-40分钟,访谈提纲见附录(附录2)。



表3 问卷变量具体信息

		变量名	题号	举例
第一部分	父母自己对死亡的态度	本人态度	13-18	13. 死亡让我感到恐惧。 17. 人终有一死,平淡接受就好。 (反向)
		认知	19、24、30、31、38、39	24. 我不知道该如何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反向) 30. 我知道该怎么跟孩子开启死亡话题。
		情绪	20、26、27、28、32、43	20. 当孩子问及死亡相关问题时,我很忐忑,不知所措。(反向) 27. 当孩子问及死亡相关问题时,我很淡定,从不避讳。
第二部分	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的态度	行为	21、23、29、33、35、37、40、44、45、47	35. 我带孩子参加过葬礼、追悼会等纪念死者的仪式。 44. 我对孩子隐瞒过家里长辈,亲属去世的消息。(反向)
		价值	22、25、34、36、41、42、46	22. 我觉得有必要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 46. 我觉得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完全没必要。(反向)

(四) 数据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软件整理了问卷数据,反转部分题目以保证题项意义的正负方向。在此基础上做了以下统计:1)描述性统计:所有题目的均值、标准差;各分量表均值、标准差;2)以父母自己对死亡的态度为因子,以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的态度为因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3)以“父母是否有丧亲经历”为自变量,以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的态度以及四个维度为因变量的分别进行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本研究对访谈录音转写并进行主题分析,分析框架主要依据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即死亡话语素养的三个层次:认知,态度及话语实践。研究者反复阅读原始语料,从访谈材料的主题分析中深入探究父母的儿童死亡教育现状,对定量数据进行有效的补充,从而更好地回应研究问题。

四、研究发现

父母在进行儿童死亡教育时所需要具备的死亡话语素养包含多个层面,即认知、态度和话语实践。认知层面主要指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和跟孩子谈论死亡的客观知识的掌握程度。本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父母是否知道儿童死亡教育这一概念,是否了解该如何跟孩子谈论死亡相关话题,是否知道哪些绘本或工具可以帮助他们开展儿童死亡教育。态度层面主要指父母是否有公开、正式和孩子谈论死亡的情感 and 行为倾向。本研究主要关注父母在开展儿童死亡教育时是否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情绪,父母



所认为的儿童死亡教育的必要性以及其对儿童成长的意义。话语实践层面是指在实际沟通过程中,父母采取了怎样的话语策略与儿童谈生论死,生活中经历过哪些与死亡相关的事件,以及是否陪伴儿童参与死亡主题相关活动。

父母的死亡话语素养的三个层面分别对应于问卷中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的认知维度、情绪和价值维度、行为维度。描述性统计显示,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四个维度的总均值为3.64,高于3,标准差为0.424;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2.48和4.86。量表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研究者将所有反向题目做了正向处理,也就是说数值越高其所代表的死亡教育相关维度就越正向积极,反之亦然。四个维度总均值为3.64,这反应出参与调查的父母从整体上对儿童死亡教育是支持的,态度是积极的。各维度均值如表4所示,由高到低依次为价值(3.79)、情绪(3.72)、认知(3.54)、行为(3.52),其中价值和情绪高于总均值3.64,认知和行为低于总均值。

表4 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各维度得分($n=289$)

描述统计		
项目	得分(分, $\bar{x} \pm S$)	个案数
总分	3.64 $\pm$ 0.42	289
认知	3.54 $\pm$ 0.53	289
情绪	3.72 $\pm$ 0.52	289
行为	3.52 $\pm$ 0.49	289
价值	3.79 $\pm$ 0.50	289

(一) 与儿童谈生论死的基本认识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显示,认知维度的均值为3.54,要低于情绪及价值维度,这说明从认知层面来看,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的相关理念和知识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并不能达到较高的水平。问卷结果显示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应该如何开展死亡教育(题项19)以及如何开展死亡教育(题项24)并没有足够清晰的认知。这一现状深受我国长期以来重生忌死的生死观的影响,无论是相关国家政策还是培训都相对缺乏,整体上对儿童死亡教育的关注度不高,导致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不足^[20]。这一点在访谈材料中也有所体现:“我觉得小孩应该要多教(死亡教育),但是我不会教,我自己也不会,我虽然很想让他去学,我也没有地方学,我自己又不会教。”(M7)“我觉得是可以和孩子聊一聊,但是我的一个困惑就在于怎么能更好的解释这个(死亡)。”(F1) M7这位受访的妈妈对死亡教育有初步的认识,也认同其必要性,但是因为没有相关的学习,自认为关于死亡教育的知识储备不足,也没有信心去开展死亡教育。F1这位受访的爸爸的困惑在于对于解释死亡这个概念的认知不足,尽快知道要跟孩子聊死亡,也不知道从何谈起。显然家长们对于开展死亡教育的必要性的认知要远远高于对于死亡教育相关事实知识和经验的认知。

近几年,随着儿童死亡教育绘本的大力推广,父母对于利用绘本作为工具开展死亡教育的兴趣日



益浓厚，这一主题频繁出现在众多知名博主的微信公众号文章里，因此本研究问卷设计中特别关注到死亡话语绘本及电影这一主题。统计结果显示，“我觉得可以通过阅读绘本或观看电影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这一题项均值高达3.95，然而“我知道一些可以用来跟孩子聊死亡话题的绘本或电影”这一题项均值只有3.36，可见，死亡教育绘本的推广有了一定的成效，多数父母发现死亡教育绘本是一种温和的预制式植入死亡教育的方式，让儿童更容易理解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内涵^[6]，但对于有哪些绘本或电影可供使用并不是非常了解。

从认知层面来讲，父母的死亡话语素养呈现出进步趋势，这一趋势与社会对儿童死亡教育关注度的提升密切相关。随着社会对儿童死亡教育的关注及推广，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了解死亡教育的相关信息。随着死亡教育相关绘本、死亡主题电影及自媒体内容的普及，父母对于如何向孩子解释死亡的认知得到了显著增强。然而，研究亦发现父母在死亡教育深度认知方面存在不足，尤其在如何向儿童传达死亡概念的技巧与方法上仍有待提高。

(二) 与儿童谈生论死的态度倾向

每个人都对死亡有自己的态度，父母也不例外，为了考察父母的死亡态度与父母儿童死亡教育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在问卷设计时用6个题目测量了父母自己的死亡态度，具体内容包括死亡的自然性，必然性，是否愿意聊死亡、是否能够平淡接受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焦虑及逃避。研究者将这一定距变量的均值依据三分位数3.66和3.33分成高中低三组，其中本人对死亡态度均值大于等于3.66表示其对死亡态度较为积极正向，均值小于等于3.33表示其对死亡态度较为消极，3.66和3.33之间为中等，统计结果分别用“态度高”、“态度中”、“态度低”来显示。以三个组别为因子，对儿童死亡教育的态度总均值为因变量进行了单因素组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有着不同死亡态度的父母在儿童死亡教育的总体态度上有显著差异 ($F(2, 286) = 42.103, P < 0.05$)：本人对死亡的态度最积极的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的态度也最积极，反之亦然，本人对死亡有恐惧的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的态度也会相应的迟疑。

表5 父母本人死亡态度对儿童死亡教育态度影响的组间差异

	本人态度分组(平均值±标准差)			F	Post Hoc (Turkey)
	态度高(n=115)	态度中(n=80)	态度低(n=94)		
总均值	3.87±0.40	3.62±0.32	3.39±0.39	42.103*	态度高>态度中 态度高>态度低 态度中>态度低
* $P < 0.05$ ** $P < 0.01$					

访谈数据显示自己对死亡态度相对开放、积极的父母亲在对儿童开展死亡教育的过程中也表现的更加积极、淡定。相反，自己对死亡仍然有恐惧的父母亲在开展儿童死亡教育时也会有更多的困惑和迟疑。

M5认为“自己对死亡其实就跟我们生活中每天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生来就知道你一定



会死,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就是一个你生活中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而已。”这位母亲面对死亡的平静,带来了她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时的开放和从容。她会跟孩子聊老人去世,会带孩子扫墓,去安宁病房,**“从来都没有回避过,也不会觉得非要回避这些”**。

F1对死亡虽然有了一定的认识,也还存在恐惧,害怕**“一旦死亡可能就永远不能再苏醒这个感觉”**。因此,面对孩子时,他**“不能很好的描述这种死亡的状态”**,虽然不避讳,但是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清楚。

显然父母对于死亡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在进行儿童死亡教育时所展现的死亡话语素养。为了更好的促进父母死亡话语素养的养成和提升,父母本人首先要接受死亡教育。只有当父母能够理解和克服自身对死亡的恐惧与疑惑,他们才能够以更为开明和成熟的心态,去引导儿童正确地认识和面对死亡。正如访谈参与者所说:**“第一就是咱们自己(父母)先学习,先了解,让我们自己对死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我们很多不认识(死亡)。”(M4)**

父母死亡话语素养的态度层面在问卷中主要通过情绪和价值这两个维度来体现,这两个维度的均值较高,分别为3.72和3.79,这说明父母在对儿童开展死亡教育时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向上的情绪;并且父母高度任何儿童死亡教育的必要性,认为其对儿童的成长有帮助,能够促进儿童更好的理解生命的意思。从态度层面来讲,父母表现出较高的死亡话语素养,这一点在访谈中也多有体现:**“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希望能跟孩子多讨论这个(死亡),你想这个事(死亡)想的多,有利于活得好。”(F4)****“我觉得其实我是希望他(孩子)可以多深入了解一下,我觉得对成长肯定是有好处的,包括我现在这么大年纪了,我都能够感觉到这是一种成长。”(M7)****“好像就是聊(死亡)得越多,越觉得她的可接受度越高,还有就是她自己的好奇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如果回避了,感觉后面会面临的更多,她的问题会积压的更多。”(M6)****“人要从小学来接受这个(死亡教育),那你当这个小孩子慢慢的长大以后他也会变成家长。他就变成父母,那他在他已经接受过这个方式教育后,他再去教育他自己的孩子,那他就会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了。”(F2)**父母表现出对于“聊死亡”这件事儿的认可和需求,但在话语中却把“死亡”这两个字用代词代替,并没有直接言说,认识和实践之间的张力体现出“谈生论死”这件事给父母带来的挑战。

从态度层面来讲,父母已经逐渐意识到儿童死亡教育的必要性,并对开展儿童死亡教育展现出日益增长的需求,父母开始培养与儿童谈生论死的行为倾向。研究揭示出父母个人对死亡的态度与其死亡教育的话语素养直接关联:父母若能以健康和平和的心态面对死亡,其在对儿童进行死亡教育时所展现的话语素养亦更为积极和开放;相反,当父母对死亡持有恐惧和回避的态度时,他们在与儿童进行生死对话时遭遇的困难加剧,有时甚至采取完全回避的策略。综上所述,父母在态度层面的转变为儿童死亡教育的推广和实施提供了基础,但同时也凸显了消除死亡恐惧和提升死亡话语素养的必要性。



(三) 与儿童谈生论死的话语实践

从话语实践层面来看,行为这一维度均值最低(3.52),问卷中这组变量主要关注父母在对儿童进行死亡教育时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切实做过的死亡教育相关活动,例如:我和孩子谈论死亡时,会尽量避开“死”这个表述(33)、我带孩子参加过葬礼、追悼会等纪念死者的仪式(35)、我很自然地跟孩子谈论过死亡(40)、我对孩子隐瞒过家里长辈、亲属去世的消息(44)等。不难看出,尽管父母对儿童死亡教育的认可度很高,但在行为上的表现并不匹配,父母在带孩子跟临终亲人告别,参加葬礼等活动上表现出犹豫和迟疑;在跟孩子具体谈论死亡相关议题时,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很好的阐释。访谈材料中,父母对于如何向孩子解释“死亡”这一概念有诸多困惑。例如,F1在解释邻居家老爷爷去世时,因为陵园在高山山上,就用“爷爷上山去了”这样的隐喻同时也会跟孩子强调,“他不会回来了”。F1这位受访的父亲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本着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所理解的死亡不应该是“上山去了”这样的解释,但面对年幼的孩子他又觉得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即使解释了孩子也不会明白,因此,他的困惑在于用隐喻的方式解释死亡是否合适,面对年幼的孩子,如何解释死亡才是正确合理的。

访谈材料对于数字材料的诠释不难看出父母在进行儿童死亡教育的行为上表现得并不是特别主动有一部分原因是并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合适的语言,这与认知维度均值(3.54)偏低相互印证。此外,其他成年家庭成员的不同声音,也给态度相对积极的一方带来了困扰。

“我跟孩子聊(死亡)的时候一般都是我们俩在一个屋子里聊。我爱人不参与。我跟我爱人没法聊。不聊,他不聊我就是找机会就想也慢慢的给他渗透嘛,因为我觉得他也要做一些准备嘛,我公公婆婆也都70来岁了,他(受访者爱人)拒绝了。我们俩(我跟孩子)都会有意识的避(避开受访者爱人也就是孩子爸爸)。”(M4)“他不怎么喜欢说这些,他也尽量叫我不跟小孩聊这些,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他就觉得说你跟小孩儿说这些干什么,还有在家里老是提这些东西干什么,你做课题做点别的的东西不行,你做这些干什么的,真的是。(死亡相关书籍)我都不能够随便放的,他说让人家看到了,人家要是在家里做客,看到你家里弄这么个书放在那,人家会不会讨厌,下次怎么想?”(M7)但是妈妈是比较禁忌说那孩子去那个地方阴气重(墓地)之类的,但我是希望能带孩子去扫墓什么的,而且有时候现在扫墓,有的季节什么清明或者说踏青了,去走一走,我觉得挺好的。(F4)可见,开展儿童死亡教育的过程中,成年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沟通,达成一致的态度和行动方案也非常重要。

为了更细致地考察人口学因素对儿童死亡教育的影响,研究者以和孩子的关系、学历、年龄及是否有丧亲经历为自变量,以认知、情感、行为、价值为因变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中,丧亲经历这一变量对行为这一维度的回归系数值为-0.134($t=-2.262$, $p=0.024<0.05$),这意味着是否有丧亲经历会对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关系,即拥有丧亲经历的父母在儿童死亡教育的行为中表现得更为积极。(表6)



表6 父母丧亲经历对儿童死亡教育的影响

变量	<i>R</i>	<i>R</i> ²	调整后的 <i>R</i> ²	<i>F</i>	<i>B</i>	β	容差	<i>VIF</i>
是否有丧亲经历	.215 ^a	.046	.036	4.618	-.134	-.136	.992	1.008

访谈语料中有过丧亲经历的父母亲对孩子开展死亡教育的积极做法对统计结果有所呼应。F3在父亲去世后,跟5岁的儿子说“爷爷去世了,已经没有了,去别的地方,再也回不来了”。儿子回答说:“我知道,爷爷已经去世了,我很难过。”随后,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把孩子带回家族墓地给爷爷扫墓,拜一拜跪一跪。孩子还曾经在清明节时写下了一篇追忆爷爷的作文。M3谈到会带孩子们到千里迢迢之外的另一个城市为爷爷奶奶上坟。“我觉得不恐惧,不害怕,那就是觉得很平和,就是很亲近的。孩子还会给爷爷奶奶去呢摆一些水果啊,还给爷爷奶奶去擦那个墓碑啊,去送花啊!”丧亲经历给了父母一个开展死亡教育的契机,通过扫墓,祭奠等充满仪式感的死亡话语实践活动,他们充分挖掘资源开展对儿童的死亡教育。

从话语实践层面来讲,父母在开展儿童死亡教育时并未展现出与其积极态度相匹配的实践行为,这一现象与认知层面的不足相吻合。父母在与儿童探讨生死议题时,表现出显著的困惑与迟疑,尤其在话语策略和方法选择方面。研究发现,具有丧亲经历的父母在引导孩子参与死亡教育相关活动(例如祭扫、探望临终亲人等)时,表现出更为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认识死亡的机会,这种自然出现的时机是人们学习、践行死亡话语素养的理想情境^[21]。曹坤明^[1]曾指出要将儿童死亡教育引入日常生活这样的推进举措,张娜娜^[22]曾指出要儿童“归为生活,感受死亡”,刘晓玲,李雪平^[20]指出要贯穿陶行知所强调的“生活即教育”核心思想,于“润物细无声”中赋予儿童生死智慧。在生活中经历和体验,抓住契机让儿童自然地参与到死亡相关的仪式中,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死亡的意义。总之,死亡话语实践的真实经历才是最好的死亡教育时机。

五、结语

死亡相关语类的消费和生产是死亡话语素养的重要体现方式。本研究从认知、态度和话语实践三个维度探讨了在儿童死亡教育中体现出的父母死亡话语素养。随着社会的发展,死亡议题被逐渐重视,越来越多的死亡相关绘本和电影的出现,助力了父母在认知层面和态度层面的死亡话语素养的提升。跟儿童谈论死亡议题,引导儿童参与死亡相关仪式是父母死亡话语素养在话语实践层面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揭示,父母表达出跟孩子公开谈论死亡议题的意愿,能认识到跟孩子谈论死亡议题的重要性,这体现了在态度层面较高的死亡话语素养,但是父母自身对死亡议题的认知不足,使得他们不具备跟儿童谈论死亡的深度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话语实践,影响了他们死亡话语素养的发展。

在当今社会发展和现实情境中,儿童死亡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不断培养和提升父母在开展儿童死亡教育中的死亡话语素养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本研究的启示,父母在认知层面需要对死亡教育相关语类更加熟悉,能够针对儿童的年龄和理解能力选择适合的表达方式解释死亡,明确传递“死亡是



不可逆的”这一核心信息,让儿童逐步理解和接受丧失的现实。在具体死亡教育实践中,要鼓励和引导儿童参与死亡仪式和表达情感,通过亲子共同参与的死亡话语实践活动,让儿童逐渐形成对死亡更成熟的理解,尊重离别,珍惜生命。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参与调查的样本特征倾向于学历较高、对死亡议题具有一定了解且死亡话语素养较高的个体,尤其是母亲群体,研究结果相较于总体实际情况呈现出更为乐观的偏差。因此,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实现样本选择的多样化,以更全面地探究中国父母死亡话语素养的多元面向,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儿童死亡教育的发展,使更多人能够在生命的尊严和死亡的平静中生活。

参考文献

- [1] 曹坤明. 我国儿童死亡教育的困境及其出路[J]. 中小学德育, 2017(8): 31-35.
- [2] 韩映红,王银玲. 美国儿童死亡教育及其启示[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4, (1): 75-77.
- [3] 孟宪武. 人类死亡学论纲[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4] 陈若葵. 死亡教育:构建一种‘人死观’[EB/OL]. (2017-03-31)[2024-09-10]. <https://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7/3/322109.shtml>.
- [5] 索甲仁波切. 西藏生死书[M]. 郑振煌,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6] 李 杨. 我国死亡教育儿童绘本出版分析[J]. 出版广角, 2018(1): 47-52.
- [7] 孟 玲. 英语儿童绘本叙事中死亡意义的多模态建构:《爸爸会很快回来吗?》多模态叙事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2(1): 12-19.
- [8] 赵 娜. 评价理论视角下的中美儿童死亡教育语篇:“Dealing with Death”和“怎样与孩子谈论死亡和生命”比较[J]. 外语研究, 2019, 36(2): 12-17.
- [9] 李 旭,段丽红. 从“一片叶子”到“寻梦环游”:儿童生活世界中死亡意义的叙事重构[J]. 教育学报, 2019, 15(5): 27-34.
- [10] 王霜霜,王鑫鑫,郭玉芳,等. 癌症儿童安宁疗护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进展[J]. 医学研究与教育, 2019, 36(5): 45-51.
- [11] 苏学宇,舒勤. 对社区艾滋病致孤儿开展死亡教育的探讨[J]. 西北医学教育, 2010 (6): 1079-1080.
- [12] 徐艺玮. 小组工作介入儿童的死亡教育研究:以深圳市D社区为例[D]. 长春:吉林农业大学, 2018.
- [13] 康 滨. 小组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儿童生命教育的研究:以甘肃省Y镇为例[D]. 兰州:兰州大学, 2020.
- [14] EVERETT M G. Helping parents teach about death[J]. Health Educ, 1976, 7(4): 27-29.
- [15] CRASE DR, CRASE D. Death and the Young Child: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on Support and Counseling [J]. Clinical Pediatrics, 1975, 14(8): 747-750.
- [16] 赵立奇. 家庭生命教育现状研究[D].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 2014.
- [17] 祁 静,曹能秀. 幼儿父母的死亡教育观调查研究:以昆明市Q幼儿园为例[J]. 教育导刊:下半月, 2018(11): 20-26. [知网]
- [18] 罗正鹏,高一虹. 走向死亡话语素养[J]. 医学与哲学, 2023, 44(8): 19-23.
- [19] CORR C A, NABE C M, CORR D M. Death and Dying: Life and Living [M]. 6th ed. Cambridge: Wadsworth Publishing, 2008: 11-12.
- [20] 刘晓玲,李雪平. 儿童死亡教育绘本的内在逻辑探讨[J]. 医学与哲学, 2023, 44(22): 29-32.



- [21] DESPELDER L A, STRICKLAND A L. *The Last Dance: Encountering Death and Dying* [M]. 10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5: 63-64.
- [22] 张娜娜. 儿童哲学视角下的学前儿童死亡教育[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14, 26(1): 83-85, 96.

Talking About Life and Death with Children: A Study on the Current State Among Some Chinese Parents' 'Death Discourse Literacy'

Ma Xiaoqi, Zhao 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eath discourse literacy" exhibited by some Chinese parents in the process of conducting children's death educ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cognitive aspect of whether parents possess objective knowledge about children's death education; the attitudinal aspect of whether parents hav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tendencies to openly and formally discuss death with children; and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aspect of how parents actually carry out children's death education and the linguistic behaviors they adopt. The study utilized a "Children's Death Education Attitude Questionnaire" as the main tool and collected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289 Chinese parent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through convenience sampling. Additionall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iness,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12 participants, and the interview recordings were analyzed thematicall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on the attitudinal level, the parents surveyed generally showed a positive and open attitude, with a high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children's death education. On the cognitive level, although parents have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knowledge of children's death education,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On the discursive practice level, parents tend to use death-related picture books and movies as educational tools, but their participation in specific death-themed activities such as farewells at the end of life, funerals, and tomb sweeping is still insufficient. The interview material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further reveal th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parents' "death discourse literacy." This study not only reveals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parents' "death discourse literacy" when discussing life and death with their children but also provides certain insights into children's death education and offer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parents' "death discourse literacy."

Key words: Children's Death Education, Death Discourse Literacy, Cognition, Attitude, Discursive Practice

作者简介 (ID):

马小琦, 博士生,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E-mail: veramaxiaoqi@126.com

赵娜, 博士, 讲师,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E-mail: wenddiezhao@163.com